

中文概念史論

啓功



钟少华 著

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文概念史論

啓功



钟少华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文概念史论 / 钟少华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078-3432-1

I. ①中… II. ①钟… III. ①汉语史-研究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68635号

中文概念史论

著 者	钟少华
责任编辑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2年7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7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432-1 / G · 1386
定 价	39.8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张卫东

概念研究，古已有之。名与实，文与质，白马非马，即其概念之辩。有些时候，还争辩得很激烈，很热闹。有了语言，就有了概念。语言与概念，相辅相成。概念清晰，乃言语交际顺畅的前提。有了文字，概念因之而可以更加准确清晰，语言交际亦因之而突破时空限制。所以，孔老夫子提出事欲成，首先要“正名”，即经研究、实践而逐步形成准确表述的“概念”。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言允矣。然而，世间就是这么地矛盾。同一位老夫子，却又主张“述而不作”。他推崇的许多观念，例如：仁义礼智信，号称是中华文化大厦的基本理念或基础构件，却很少作严密的逻辑证明。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亦遵循“圣人作，贤者述”的教条，或以故步自封，或以保守传统，或以掩饰其不才，甚至是莫明其妙的“不争论”，致使这方面的研究常常离开“高速公路”而进入“停车场”，致使许多“观念”不能变成准确精密的“概念”。中文概念的发展史，从一开始就颇多纠结。其后发展如何？而今状况又如何？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这是读者所关心的。钟少华先生《中文概念史研究》一书，用不多的文字，不仅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常常作为第一读者，常有引人入胜之叹。书中强调，从观念到概念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实践过程。这中间，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空间。今天，欲在中国推动概念研究，尤其需要更多的自由空间，所以，一要呼唤政治改革，二得敢于较真儿。在皇权钳制下，更需较真儿的勇气。中国的概念研究史上，不乏较真儿之人。东汉的王充，就敢较真儿。他的《论衡》，就是一部较真儿之作。《论衡》的《问孔》、《非韩》、《刺孟》、《知实》等诸多篇章，就儒、法的仁、义、礼、智、信、天、命、是、非、圣、贤、上智、下愚、小恶、大恶等一系列概念，全面发难，让读者常常感到一种解放与轻松。钟少华先生也是这么一位较真儿的人，他的这部新作，也是一部较真儿之作。当代的文化建设，就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品。所以，我很愿意借少华先生大作付梓的机会说几句话。

概念史研究，我的理解，就是对概念作历史语义研究，关注的是语义发展史，是对概念或观念的跨学科研究。哲学上的概念，语言学上的语义，辞书学上的理想条目，各有各的范畴，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少华先生倡导的概念史研究，是将它们的主要内涵互相协调，以图理解与建构对于概念史的认知。他并非要搭建一座空想的中文概念史楼阁，而是力图探索其中的脉络与例证。

这既是社会文化学中的基础研究，又可能升腾为理论哲学的探讨。其一部分，属于语言学应该做并且要做好的事。作为一名语言学工作者，凭心而论，应该承认，这方面的工作，无论是投入还是成果，都令人汗颜。对于概念，中国人似乎有种天生的倾向，就是“不求甚解”。古人有“字”的概念，没“词”的概念，常常分不清“字”与“词”。“中文”、“汉语”，算是现代词，可好多现代人也混着乱用，常听人说“说中文”、“写汉语”。这是属于概念意识不强，多提醒就是了。一个字，一个词，往往就是一部蕴含丰厚的文化史。辞书，是概念和概念史研究的成果。多出辞书、出好辞书，是强化概念意识的强有力手段。然而，我们的辞书编纂与出版，不能不说是太过于落后了。好多概念，形成并有了约定俗成的说法儿都有年头儿了，可是在权威辞书里还

是一笔糊涂账。举个例子，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里有不少当时的口语词，反映的是当时人的概念，今人不熟悉，当然希望通过辞书的帮助得以切实了解、把握。比如有个词“红姑娘”，放在一个宴会的一长串干鲜果品名单当中，显然是一种果子，但究竟是什么果子？我就把它作为功课交给一位本科生。经过五个月的努力，她写成一篇《“红姑娘”考》，并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她发现，在图书馆和网上能查到的众多大小辞书中，只有《汉语大词典》收为词条：“红姑娘，酸浆或雀瓮的别名。”《辞海》则在词条“酸浆”中提到：“酸浆”别称“挂金灯”、“红姑娘”，茄科。……除西藏外，分布几遍中国各地……《中国植物志》载，酸浆属下植物约120种，几乎世界各地都有，我国有5种2变种。两个变种，一种就是“红姑娘”，另一种是“黄姑娘”（又称“洋姑娘”）。酸浆，历代《本草》多有记载，《本草纲目》卷三十九载有“红姑娘”，是目前所知最早出处。“红姑娘”是我国药食两用的保健型多年草本野生水果，如今已大规模栽培，成为各地超市常见的时尚果品，比苹果贵一倍还多。“红姑娘”，也是古今文学作品中的“常客”，清初纳兰性德有词《眼儿媚·咏红姑娘》，周汝昌先生也曾撰文考究这“红姑娘”可能正是《红楼梦》里的“绛珠草”。通过网上查询，还可得知，酸浆并非中国特有。从《老乞大》可知，在中国，在朝鲜半岛，早有分布。在南非，酸浆果酱或罐头，乃当地居民日常食品。在日本，每年7月9、10日，东京著名的景点浅草寺还会举办“酸浆集市”。这个“红姑娘”，古今中外，广泛分布，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辞海》里看不到这些文化内容。《汉语大词典》竟说“酸浆”又指“酸浆草”，犯了概念上的错误。“酸浆草”是什么？是“匍匐茎”“多年生草本植物”。从植物学立场说话，“酸浆”跟“酸浆草”绝非一物，各有所指，不能混为一谈。继续查下去，就会发现：（1）此二物自古至今常被混淆；（2）与此二物相关的词语，聚合为一个颇具规模、错综关联的词语群落；（3）此二物之混淆，连带着让一些词语也发生混淆，致使《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亦未能幸免；（4）从语音上看，“红姑娘”多儿化，其第三音节，北京、河南是[niär⁵⁵]或[niar⁵⁵]（阴平），东北三省是[niär²¹⁴]（上声），山东是[niär⁵⁵]或[niär²¹⁴]，跟“娘”字不同调，甚至不同音；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山东、天津等地，还有另一种说法，叫“红姑鸟儿”。可见“姑娘”二字在这里只是借用而已，其本字是什么？其语源何自？若是汉语，那是汉语哪个方言？若是非汉语，究竟是何语种？从历时与共时的角度看，“红姑娘”这个词儿，还有不少问题有待研究。

钟少华先生在书中大声疾呼加强汉语概念史的研究，我举双手赞同。至于概念史研究的一般方法，看得出来，大多是钟先生从自己近30年来的实践体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可行，可贵，很值得借镜。拜读过钟少华先生的书稿，沿着他的思路，我觉得，若要一改我国概念史研究的落后状况，须再补充两条：一要建立并逐步壮大专业队伍，要在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招收、培养概念史研究生；二要建立囊括古今所有汉字的“全汉字字库”和“全汉字操作系统”，与此同时，逐步建设囊括中国古今所有文化典籍的大型数字化数据库，从单部典籍原件高清扫描配以原文录入开始，到多部通检，可顺时通检，可逆时通检，可历时通检，可共时通检，从字、词通检到主题、专题智能通检，同义词语通检，反义词语通检……总之，不断创新、改进这个数据库，使之成为概念史专家进行研究的得心应手的好帮手。这种类型的中文典籍数据库，海峡两岸，海内海外，大小大小，已经有若干了，如果有谁能出面联络、协调，以网络形式联到一起，那么，理想的囊括中国古今所有文化典籍的大型数字化数据库，定可加速建成，并将不断升级，越发得心应手，我国的概念史研究，定能取得前无古人、无愧时代的进步与成就。

祝愿钟少华先生大作的出版，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从而让我国的概念史研究获得更多更大的推动。

目 录

中文概念史研究	1
中文“概念”之生成与发展	25
中文“文学”概念史	33
中文“科学”概念史	52
中文“哲学”概念史	68
中文“文化”概念史	92
中文“方法”概念史	115
中文“真理”概念史	129
中文“知识”概念史	151
中文“人”的概念史	166
中文“生命”概念史	187
中文“民俗学”概念史	207
中文“标准”概念史	219
中文“印刷”概念史	231
中文“卫生”概念史	242
中文“繁体字”、“简体字”概念史	252
中文“宣传”概念史	256
后 记	279

中文概念史研究

一、前言

(一) 历史角度

具有 5000 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文字是以方块字为基本特征；并且在公元前 200 年的秦朝，就提出“书同文”的规范性要求，这是文化进步的标志。可惜那时又有“焚书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导致“书同文”的实际规范效果极其缓慢。到 1716 年，才有清朝皇帝康熙下令编纂的《康熙字典》出现。该书全面总结中国字的状况，在 47035 个字中，古废字、冷僻字、错写字、简体字等占到 70%。也就是说，1900 年之后，我们才将约 7000 个常用字仅是规范了其方块字的形状。而其注音则因为用反切音方法，而依然模糊；至于具体字义，则往往保留史籍上不同的字义解释，保留了一字多义现象。

可以说，古代中国文化仅做到了提出“书同文”的规范性要求，做到了方块字的一般形状规范。至于“字同音”、“字同义”的进一步要求，则远远没有在古代实现。特别遗憾的是，古代中国语言文字研究大家蜂起，对于训诂学大有丰硕成果，但谁也没有提醒历代皇帝去让中国文字继续进步。

结果，“字同音”的实现，是在 20 世纪初叶，被一群语言学家借助国家力量进行尝试，并且获得成功（由于不在本文讲述范围，从略）。

结果，“字同义”问题的解决，在 19~20 世纪的中外人士合作努力下，已经有长足进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现，可以作为标志之一。不过，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字义问题。本文也基本不讨论。

一个单字，在历史上逐渐难以一一对应复杂的思想表达，意义相近的字叫做近义字；意义相反的字叫做反义字。但还是不够用，于是，很自然地出现用两个字或几个字并成一个专门的意义，这就叫做“词”或“词组”。“词”当然是字的深入利用产品，每一个词的词义组成，都有其复杂的文化因素，来龙去脉也很是复杂，既有其组成字的原来某些字义，两字并列合成后，可能删去某些原组成字的原意，也添加某些新意义在其中。只是在古代中国农耕社会基础上，对于十分复杂意义的表述需求是比较少的，因此在古代，词的出现相对来说比较少，并且也与字类似地缺乏对于词义的规范，给后人留下无数搅不清的麻烦。看看历代大量文字狱的史料就会明白，正是由于传统中国文人喜欢追求远古经典，形成好古用典的思维方式，而偏偏古字词的诠释，不是社会所形成的概念公允性，而是按照皇帝的个人观念为杀头标准，也就是皇

帝可以随心解释字词的意义，并且依照他的一时解释来判断。其结果，就是在18世纪以前，中文字义的解释，是相当随意的，中文词义的解释，同样也多随意利用。

19世纪初，由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来华人士，需要学习中文来与中国人进行交流，于是中文语义问题被他们加以重视和研究，并且开始通过工具书形式来建构双方都能利用的双语大桥。就有如蝴蝶效应一般在中文里面搅起语言风暴，语义概念问题被提到民族改革的进程中，至今依然在进行中。

偏偏两百年来的相关积淀，由于其难度与史料的缺乏整理，长期缺乏中国的研究者，更加增添语义概念研究的难度。

（二）哲学角度

从哲学角度说明某一个事物的映像在人脑中形成“概念”，是很复杂的研究过程，也是很漫长的研究过程。而中文“概念”这个词的出现，虽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对于“概念”在中文里的诠释则更加复杂与淆乱。每一个人从小就开始踏上追寻“概念”的无休道路，开始先是被亲人和环境包围时，就要肢体语言和发音来表达他脑海中的象征性反应，逐渐积累变化成为他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观念。当这个观念在运用中被现实所否定或淆乱后，就只能不断地修改，直到更加淆乱，或者可能略有进步。从几千年来的人类进步史看，能够改进的唯一办法，只有后天的教育。但是现实的教育制度并没有给出准确的最好的求知效果。因为这很困难，每一个人，既要追寻安慰自己的真理知识，又要应该承认自己认知中的错误。例如老师和家长都会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数学上的概念。但是放在政治学中、经济学中，就不一定，一加N可能等于负数；一加一可能等于三以上，这就是政治等外来因素改变了判断概念的标准。如古典启蒙读本《三字经》首句：“人之初，性本善。”重复了多少年，现在就有人将之认作概念。殊不知，这只是作者善良的愿望，并没有经过科学认证或证伪。古今中外无数哲人讨论过这个“性本善”或“性本恶”的说法，至今还是纷纭不断。我们只能当做一种个人观念看。

笔者认为：

A. 观念

记忆以及想象等而浮现于脑海中的具体印象，即是直观内容。观念是特殊的、个体的、具体而又孤立。观念用语义表示出来，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语义，逻辑不严密，难有公信力和公允性。

B. 概念

概念的起源是由于人们对于具体复杂的事物的认识逐渐淡漠，而渐渐变为记号。记号的移用而至于普遍，形成共相。概念是再把各种观念互相联络集合，经过验证，统一成为全体的普遍的要害，进而为思考表述的对象，以求准确的知识。概念用语言表示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语义。没有语义，我们的概念就无法传达于他人。即使自我思考，也需要借语义的功能，以明概念的意义。因为思考是以判断为归结，判断是比较两概念或各种观念，以求得其关系或性质。没有语义，思考也就失去工具。概念的內部研究，就是研究语义所共有的本质属性，即意义。概念从外部研究，就是研究语义的范围。或扩展，或缩小，或嬗变等。

C. 概念之作用

a. 辨识——就固有概念，以辨定新生之事物。

b. 比附——辨定新生事物，又就固有之概念，与之相近者，以推阐之、比附之、使其意义完全无缺。

c. 归入系统——新事物必应有所属，于是就其性质而纳入某种系统之中。

D. 概念有三种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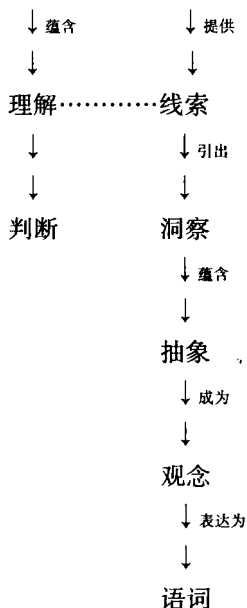
a. 必有所指。

b. 必有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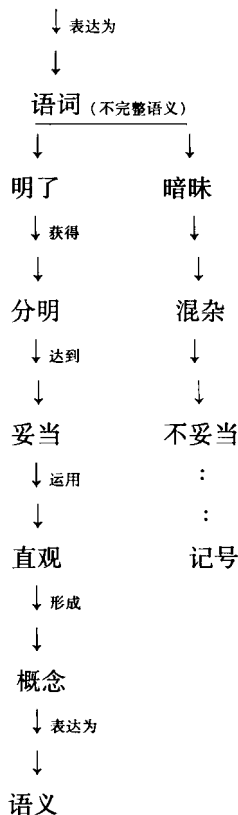
c. 能有规范作用。

从以上四种基本认知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讨论从观念升华至概念的漫长复杂过程的一般程序。这是概念史研究的关键程序。每一个人都会获得经验，某种经验可以用图像去表述，也可以经过理解，然后经过某些线索，引出可能洞察的意念，其中蕴含着抽象。从抽象中再成为观念，能够用语词表达出来，语词中就有部分明了，部分暗昧。明了部分再将分析是否分明、是否妥当、是否直观之后，就应该形成普遍适用的概念了。这些概念由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完整的语义。至于暗昧部分，由于混杂等因素，作为普遍适用的语词并不妥当，最后顶多是一个历史上抛弃的记号罢了。可以用如下两个示意图表示：

经验 → → → 图像



观念



笔者所列图，根源在古代西方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近代中国哲学家也对此有所讨论介绍。这符合概念发展的历史，语义形成的历史。表中几个词，还可以略解释如下：

明了——自身反复皆认为正确，并且可以意识到；也与其他概念界限分明。

分明——内容中所形成各种征象及其各种对象，已经得到完全之规定，具有明确的意思。

妥当——其外延及内涵，不但没有反对矛盾之处，更做到当存者存，不当存者不存。

直观——概念的内容可与本人的心意直接感触。人思考的语言，常用记号，若征之于实际，必定由心中经验直接接触，其意义方能够显示。至于本人始终不能经验者，如鬼神、无限等，就不得不借助他物来代表，有所象征，而后才能认作直观判断。

只是有人偷懒，以为可以简单按照时髦用词，让观念随意一步到位地变成概念，可以随便转换使用。我们只需要看看精神层面上的许多观念，特别是伦理观念、宗教观念，是早在两千多年前涌现出来，常识由于后人没有将之系统逻辑地严密推理证明，一直照抄两千多年，重复多少遍，也不可能自动转变成概念的。到今天，我们如果想要获得准确概念或语义，依然无可避免地还要做此最根本的逻辑实践工作。更不要以为有百年前外国人的概念翻译，就能让中文一步登天，轻松省略千余年的时间，能够让中文自动就变成规范的概念。

最简单地说，从观念发展进步到概念，就是人们认知中重大的一步，寻觅表述人们情感最清晰准确的词语概念。概念与观念有本质区别。观念是表象的，是特殊的，包括一个。观念实际存在，属于心理范畴；而概念则是普遍的，包括一切。概念非实际存在，是意念，属于逻辑范畴。

概念远比观念具有社会实践后的公允性，但概念也并非永远不变。具体某个概念会在社会实践的漫长过程中逐渐被修订，或者更完善，可能变成新概念。本文要讨论的概念史，正是通过史实，反映这种大尺度下的文化现象。

（三）语言学角度

概念的载体在语言学中正是字义、词义、语义的完整表述。一个概念的完整表述，用语言文字来与他人交流，正是要求一个字义、词义、语义的准确表达。概念史当然就涉及字义、词义、语义在中文历史中的形成与演化。偏偏这是一直难以说清楚的。

中文研究传统中，字形、字音的研究可以说十分发达，而字义的问题则严重混乱与模糊。这对于 19~20 世纪的学者研究很不利。究其源，即是由于方块字本身的特征，也是传统研究方法的误区。正如 20 世纪 20 年代北京大学沈兼士教授所总结的：

中文文字的穿凿和变迁看起来，最初是用形象来表示，进而用意义表示，更进而用声音来表示，其由意符的区域过渡到音符的区域的轨迹，是很明显的了。可惜到了半音符阶级，却走错了歧路，遂至终于不能完全脱离意符的束缚而成就一种有规律的字母文字。所谓歧路是什么呢？就是“借字表音”这个方法了。这个方法的弊病：（1）拿一个字的声来比拟他一语的声音，当然不能绝对的确切。（2）无限制的借用一切固有文字，以为表音的符号，手段太不经济。（3）所表示之语言的意义和被借为音符的文字之本身的意义，日久往往发生一种纠葛不清的疑惑。（4）有了这个以不造字为造字之消极方法，救济半音符之穷，于是苟安

一时，而不积极的去想法造那以简御繁的正式音符文字，这更是大失著了。总之中国人是把意符的方法太看重了，随意到第四级，虽名为“表音”，却仍摆脱不了意符的形式，倒累得语言亦受了这个形式的牵制，不能应社会组织之复杂而自由发展。所以外国学者常常批评说“中国文字构造虽精密，而应用却繁难”。这个批评，颇为精当。中国语言到今日仍徘徊于语根语阶级，而不能完全达到语尾语的原故，实在和文字有重大的关系啊！^①

沈教授甚至认为：

篆体变隶之后，指事、象形、会意各种造字之精义，顿然消失。各种文字都成烦杂而无意识的点画钩捺之集合体，认识记忆，均极困难。^②

中国传统训诂学多是从四个角度去“求”字义：

“据形求义”，即是从某汉字字形分析其字义是否恰当。

“以音求义”，即是从读音分析其字义来龙去脉。

“考经求义”，即是从不同古籍中用字来比较字义可能的变化。

“明例求义”，即是从不同古籍书上的例句来比较语义的变化。

这些作为方法是成功的，但是要注意，其中没有一种方法，是企图解决某个字词的字义、词义的内涵是什么，即根本不触及字义本体性。也许古人认为许慎《说文解字》上的说辞是金科玉律，只需照搬就可以了。但这对于今天的读者则造成概念认识上巨大的空洞。

在19世纪初期，另外一种研究中文字词的道路开拓了。那是一批来华的外国人开始走的路，他们可能利用过中国训诂学家们的成果，但没有直接交流的机会。他们上承17世纪开始来华的利玛窦、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作者）、匡卫国（《中国文法》作者）等人的思路与实践，下接中国南方的文化氛围，也为了他们自身需要，硬是在困境中深入研究中文，结果给中国和西方之间建构了语言知识交流的桥梁。同时为中文的深入研究开拓了新途径。其中代表首先应该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在来到澳门7年之后的1815年，就出版中文书名《通用汉言之法》一书。该书内容有27节：汉语的特点；中式发音法；欧式发音法；汉语音节表；汉语声调；声调练习表；关于汉字；部首表；中文字典；标点符号；名词；数量词表；后置于名词后的功能词“者”；数；格；性；形容词；数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叹词；地方方言；句法；诗词格律。该书是以他所掌握的英文文法中式和中文知识，来向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介绍中文。他是以教会他人为目标，因此中文字词的内涵自然就成为重点，而语音则用欧式注音法来辅助，基本上就无须探讨由发音而导致的古汉语字源问题。因此让学习者能够避开馆阁体文风，从新角度思考中文语义问题、文法问题。马礼逊等人开拓并奠定了近代研究中文的新基础。

不幸的是，要到1898年的马建忠先生发表《文通》一书，才有中国人全面用新方法研究中文，而且正如他在书后写：“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

① 沈兼士文《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卷1号，写于1922年8月22日。转引自《沈兼士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12月一版，页39。

② 同①，页396。

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③ 只是他的意图，百余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究根源，一来是近代中文因社会大变革而引发的词语海啸太丰富复杂；二来是研究中文语义学的投入与学者太少。本来词语海啸的翻滚，是民族在社会进步中的好事，但问题是一直没有清理这些词语概念的增添和嬗变，特别是旧字词语概念的演化，以及新词语的引进或自生，一直是在混沌中自生自灭。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大缺失。

幸好的是，还是有些有心人关注。只是这些人多数不是语言学家，而是哲学家。在清朝末年的中文哲学著作中，不少都会谈到概念与语义的关系。严复老先生在 1909 年就曾感叹道：“且将见吾国之文字语言，以之事精审致知之科，非大架厘定改良，有万万不可用者。……是以不佞常戒后生，欲治物理稍深之科，为今之计，莫便于先治西文，於以通之，庶几名正理从，於所思言不至桀乱。必俟既通者众，还取吾国旧文，而厘订之。经数十年而后，或可用也。岂得已哉。嗟夫，此於知者不待言，於不知者，虽言亦无益。”^④

李安宅教授是很早研究语义学之一人，他在 1931 年就出版《语言底魔力》，接着又出版《意义学》（1933 年冯友兰序），他在书中写道：

文法弄到极处也不过变成修辞学，告诉我们一句话怎么说法。好像裁缝匠专管衣服怎样做，至于衣服对于人有怎么作用则管不着。……文法也只管句子合乎文法不合乎文法，不管句子与思想意向相称不相称。注重文法的人，都是牺牲了思想意向来凑合文法，有如“削足适履”。意义学则不然，对于一句话，一篇文章，它要研究所陈述的是甚么。对于所陈述的东西有甚么态度，对于听者或读者有甚么态度，具着甚么希望。……总括一句话，意义学要问语言与语言所要尽的使命到底相适不相适？^⑤

李教授说得很对。几十年后，高名凯教授、孙常叙教授都有继续的研究著作。

但是，目前到底应该如何如何在电脑时代开展全面的中文语义整理与研究呢？这是一个十分巨大又十分必要的课题。

本文研究的重心，在于由字组成的“词”所引发的词义问题。有了词义、语义，才可能讨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变化，才可能讨论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词义如何被认知的问题。

（四）辞书学角度

辞书是文化的工具。

字典里能看出大智慧。（钱钟书语）

概念、语义都需要载体，载体正是辞书中的条目。

一般完整意义的字典，应该在条目中写明字形、字音、字义。如果一字多义，亦应该分别注明，再加上例句说明。能够得到读者公允性判断与利用。能够让读者获得一个该字的简约化概念。

^③ 马建忠著《文通》后序，转引自何九盈《中国古代语义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年 9 月一版。

^④ 严复编译耶方斯《名学浅说》中加进他自己的话。《名学浅说》，商务印书馆，宣统元年（1909）正月一版，页 36。

^⑤ 李安宅著《意义学》，商务印书馆，1933 年，冯友兰序，页 6。

一般完整意义的词典（辞典），应该在条目中写明词形、词音、词义。其中对于词义，要说明词义的来龙去脉，以及一词多义的词义的诠释及例句。能够得到读者公允性判断与利用。对于中文词义“旧瓶装新酒”现象，要特别明确其内涵的变化。能够让读者获得一个简约化的概念，能够获得公允性判断与利用。

一般完整意义的大型百科全书，除了词典的全部要求外，更要在词义内涵上面深入广泛地展开阐述，包括对于该词义的不同认知理论的公允性阐述。让读者通过一个条目，就能够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完整的语义。

在实际纂写辞书条目时候，几百年在世界各民族辞书的实践中，已经形成公允性，并且能够尽量诠释词义概念。只是在各种主编需求下，难以达到理想化而已。

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愿望，圣人言仿佛绝对真理一般。其实任何个人的言论，说到底是他们个人的观念，是由他们的个人需求而任意表达的。到明朝王阳明先生，开始明白“圣人是做不得的”。但是一直有人想做圣人、贤人，总想替天立言。这就在古代中文的文化建设中，往往误将个人的观念假设为真理，并没有让个人观念在社会实践中辩论修正，并没有使得悟性升华到理性层面，以致千年前的一句话，就会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概念真理，仿佛后人只需要一成不变地重复制古人言，就天下太平了。打破这基本点的是近代新思想，近代中国人需要理解社会文化问题的真相，再精辟的古代咒语也救不了认知的原则，于是大量辞书应运而生，给中华民族提供全新的认知概念的工具。

现实的另一面是古代中文字书内涵严重不足。由于缺乏对于概念的追求，古代虽出现大量字书，但多数是对于字形、字音的考辨，也相当有成绩。而对于字义的考辨，虽然也有成绩，但除了数量较少外，还因为古代研究字义者缺乏注意时间连贯的文化原则，导致相关的考辨在时空间乱跳跃，长期难以具备说服力。19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一些字典、辞典、百科全书，这才开始注意条目语义的表述。

综合以上几个角度的研究，说明中文概念史的研究，必须注意把握以上各个传统领域的状况，并且必须要综合起来，才可能有清晰的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哲学上的概念，语言学上的语义，辞书学上的理想条目，作为各自的范畴，是不能完全画等号的。笔者只是将它们的主要内涵互相协调，以图理解与建构对于概念史的认知。

而要想初步说明以上思想的实证，笔者用的方法并非搭建一座空想的中文概念史楼阁，而是力图探索其中脉络与例证。下面将顺序探索：中文词概念之源的问题；中文词概念之演化的状况；研究中文词概念的基本方法；研究中文词概念的意义。

前辈们对于概念、语义的研究，百年来多有珍贵的指导性意见，特别是孙常叙教授的《汉语词汇》^⑥和高名凯教授的《语言论》，都是笔者经常请教学习的。笔者只不过是顺着他们的意见足迹继续探索。

西方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自20世纪中期开始，一些权威性概念史辞书连续出版至今，其思想、方法以及概念史辞书的编辑出版（笔者称之为语义典），多值得我们学

^⑥ 孙常叙著《汉语词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一版，1957年4月二版。

习与分析。目前，笔者的中文概念史研究，其思想与方法基本与海外相类，其差别较大之处在于，笔者目前所述的概念语义，还不是一个“语义域”（Semantic field），即还仅是某一个词的概念史，而没有将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全部包括进来。

二、中文词概念之源的问题

中文字词的出现很远古，字更在词之先。远古时期，当某一个人发出某个声音来表示他的观念时候，就意味着概念有可能出现。当某个字音经过家庭、族人、社区、地区逐步了解并接受时，局部地区的能够交流的一个观念就逐步形成了。但是当另外一个人针对他所认知事物现象，而得出不同的另外一个观念时，就产生不同观念的论辩。如果再有第三个、第四个或许多不同观念混杂出现时，理解中文就变得十分混乱与复杂。中文词的出现要晚过字的出现，因为只有当单个字所要承担的表述语义不够使用时，只有将两个字或多个字合成一个新的语义。经过漫长数千年的交互应用实践，才可能积淀成一个有着独到语义的词，或者是一个词表达着几个语义。这是正常的文化成长过程。

只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特色，话语权的阐述长期是由皇帝说了算，因此虽长期积累大量字与词，但缺乏社会实践所能解决的字词语义的进步问题。到明清两朝，积淀的上层文化，就可以类书为代表。类书中的相关字书，积累很大的字词因人而异的语义的说法。其中最成功的应该是《康熙字典》，但它对于当时认识的字义说明，是很混杂的，又太简单，但总算是集古代之大成了。当年一直没有编纂《康熙字典》的意思，大概也没有此能力。因此到18世纪以前，中国一直缺乏收集词义的权威工具书。

到19世纪初始，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15年开始在澳门编辑出版《字典》、《英华字典》等工具书，条目中摆脱中国旧传统表述内涵，出现大量中英对译的字词，开始在中文里面掀起语言海啸。随后1866年德国人罗存德（Rev. W. Lobscheid，1822～1893）在香港编辑出版《英华字典》，更是广泛地将中文字词，包括例句，与英文语义相对应，完成了中国与西文语言文字交流的知识桥梁。中国社会迎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五四运动等，其中特别是由于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许多新日文词语，搅得中文语境大变，特别是词语语义旧的大乱，新的也说不清地大乱，可以说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文海啸似乎越来越大、越来越乱，而中文语义的清理却越来越显得跟不上需求。

自19世纪后期到1949年，还是有不少有心人开始热衷梳理中文新、旧语义，清末出版约50部辞书，民国出版300多部辞书，就是这种梳理的明证。虽然这些词书条目的编纂还很初级，并不能全面尽善需求，但已经是开始脱离人治观念第一的原则，而是以社会公允性为第一目标。其中特别是被赋予新知识概念的阐述，那是尽了当时书生们的历史责任，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文化建设的新一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东吴大学黄摩西教授在1911年编纂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其条目语义的阐述是空前丰富与多彩。

笔者在其中荷锄挖掘近30年，不明白之处依然很多。就说中文是以“字”为基本认知基

础,但荀子早就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到20世纪黄侃老先生解读为:“是知华夏之语,单复兼行。单以立其本,复以广其用,故文字虽约少,可以达情,可以极物也。”^⑦意思很清楚,偏偏却将复字称作“联𣪠字”,而不称作“词”。符定一先生穷一生之力,在1940年写成400万字的《联𣪠字典》,收录“词”23000余个,为后人留下清晰的古代人使用“词”的例句与演进与他的诠释。其中,一词多义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

那么,对于19世纪以来所产生的新词语、旧词语内涵变换(旧瓶装新酒)的整理,虽有不少学者立下雄心整理,却因各种非人力因素而难以大成,一直拖累至今。笔者更无整理之雄心,但却想描述前辈们辛劳之成果。还是要从词义研究的源头来介绍。由于古字源、古词源、古语源的研究,在近年出版的许多语源学专著中多有介绍,也不需要笔者重复。大家也清楚,近代普遍使用的词,无非有两类:一类是近代新造词。新造词的有中国人、西方人、日本人。这些词的概念一些后来逐渐被中文系统接受了;二类是将旧词的概念变换,成为旧词形却是新概念。如此引用改造的人也是有中国人、西方人、日本人,也是逐渐有一些被社会所接受。这种分类没有什么争论。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近代词的来龙去脉清理了吗?引发笔者思考的是一位日本学者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他研究中日语言交流两千年,他的结论是“古代是日本人向中国人学习汉语,近代则是中国人向日本人学习汉语”。他举出6个中文词为证据:“问题、全部、参加、国际、实现、内容”。按照他的排列,他认定这6个词的出现源头例句,都是近代日本人首先使用,而后才有中国人使用。^⑧笔者相当怀疑此判断,于是请教由钱钟书先生所设计的中文数字文献库(专称扫叶库),他们很容易就查出这6个词的古汉语出处。其中5个词语义源头清晰,都是古汉语,没有争议,只有一个词有不同解说。笔者还注意到,他所使用的中文词最早出处,是与目前中国大型《汉语大词典》(罗竹风主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同出一辙。^⑨因此说明其解释的原始,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就没有弄清楚。

笔者由于不断遇见此类现象,于是好奇想查一查,因为6个词也太少了。笔者找到日本佐藤亨先生著的《现代に生きる幕末・明治初期 汉语辞典》(2007年一版)^⑩。这是一部中国还没有的语义典,它的条目是能够将早期某词的出处与说明介绍,特别是在近代工具书中的说明情况,全都顺序排列出来,还加上著者的说明,给予读者很大的方便。佐藤先生特别强调汉学与兰学对于近代日本词语的影响,其选择之宽,查阅之精,是很精彩的日本汉词研究的新力作。(不再是如目前中国词典般一词选一个语义。)笔者从中好奇地随机选择100多个日本汉词,由于它们全部都是日本在近代日语中涌现出来的新词语,这些日本汉词与中文语词有着密切关系。笔者随即将之与扫叶库中的相关中文文献比较,立即出现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笔者还是不放心,又将上述罗竹风的《汉语大词典》,以及黄河清先生新编出版的《近现代辞源》中的相关词语也并列在一起^⑪,结果形成一个长长的比较表,其中将每一个

⑦ 黄侃“叙”,载符定一撰《联𣪠字典》,中华书局,1940年原版,1954年2月二版。

⑧ 宫岛达夫文《语汇史の巨視的比较》,北京大学,《第一节汉日对比语言学研讨会资料集》,2009年8月。

⑨ 参见拙文《中日近代字词交流的误区》。

⑩ 佐藤亨著《现代に生きる幕末・明治初期 汉语辞典》,日本明治书院,2007年6月一版。

⑪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4月一版。

词，分别按照日本汉词认定的语源、扫叶库出现古汉语语源、罗本选用语源、黄本选用语源顺序排列。

比较结果很明显，虽有少数应该是近代日本人首先使用，但多数是古汉语，早就在使用的，并非如一般人习惯猜测是日本人传给中国人的。笔者将其中 82 个词排列，就足够清楚了。其中即使有语义古今不同，即旧瓶装新酒，也不是语源问题。^⑫ 注意，近代日本人如何改造古汉语成为日本新汉语词，那是他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自己的语源研究，我们也会向邻居学习借用词语，他们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成功经验，但不能将主客颠倒。

至于概念从观念中提炼升华的过程，那就是中文进化的历史。理论的过程已经写在前言中，至于具体每一个字词的演进过程，那是各个不同，只能一个一个地去挖掘整理，如同对待每一个出土文物一般。因此，源头问题是科学性的起步。

三、中文词概念之演进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太过于漫长，中文词概念的形成与演进就受到社会发展缓慢的控制。虽然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变革或革命时期不断，却在稳定压倒一切之后，依然还是人治，特别是皇帝的人治，其金口所下的圣旨，强制着文化语言的概念是决定性第一的。只有当社会发展温和，才可能有如先秦百家各放的言论，有盛唐诗歌的自由奔放词语，有明代市井文学作品的丰富多彩等。而一旦皇帝需要表达强权，那就是一连串的文字狱的人为制造，最方便地从中文词语的诠释入手，往往一族人的生命就死在一两个字词上面。儒家还发明“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的语言关系，一个“死”字还得是皇帝荣幸地赐的。这时候绝不讲古人云：“上天有好生之德”，而是“奴才该死该该死”了。古代语言中明显的是强权观念占据诠释权，也就无形之间扼杀了词概念的普遍出现。

中文字的诠释，也由于长期停留在《说文解字》为基础的简单原始方法上，所以当《康熙字典》整理字义的诠释，也才进步到认同一字多音或多义，具有了字源与古代观念性用法，还是很难说成是概念的介绍。

只有到 19 世纪中文语言海啸卷起来，中文旧字义、词语、语义的诠释，与新词义的诠释，都让中外学者头痛，以马礼逊为首的西方人开始通过自己编纂双语词典来诠释，概念的必需就成为最关键的事情。中国人也因为时势渐渐需要了解外国人说的话、做的事与我们的关系，也就必须要了解其概念，以能交流。

影响演进的因素很多，主要可以分为：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经济生产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社会应用因素等。

^⑫ 黄河清编《近现代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 6 月一版。

（一）历史因素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什么样的个人观念都可能出现，因而其演进成概念的几率也复杂。可以说每一个词都不同，只是大致上显现出快慢起伏。笔者曾做一个词“生命”的概念史，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生命”的语义，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说法：

“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战国策·秦策三》——生物生存的能力。

“我無生命矣。”《国语·吴语》——比喻事物借以生存的条件。

“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南朝钟嵘《诗品》卷上——犹命运。

“忠憤所感，卒獲生命。”唐白居易文——活命。

“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六祖惠能《坛经》——指有生命之物。^⑬

如果再将“生命”与“生”混用，就能够出现好几十种古人说辞，多到令人疑惑。只有当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需要已经概念化的词语来对应中文，于是如前述过的马礼逊，在澳门于1822年编辑出版《英华字典》，就开始以英文词对译中文词，构建了双方通道的知识桥梁。书中条目有：

LIFE 生命

（中文例句有）救生命；人生在世，如白马过隙；人生世上如电光石火，急急行善犹恐不及，况为恶乎；放生；人生可笑；春梦做完犹相续，天机有碍尖还钝，野马无缰快已迟；人之所欲，无甚于生；舍生而取义；性命是天与的；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哪管人唾骂。

DEATH 死亡死

（中文例句有）死有余辜；已是死在旦夕；朝夕寻死；是死罪；他是死床；生死永忘；赐死于第；人之所恶无甚于死；乐逸于死。^⑭

后来在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德国人罗存德（R. W. Lobscheid, 1822~1893）在香港1866年，编辑出版《英华字典》，进一步建构了中英语言交流的桥梁，可惜的是，中国人似乎并不重视，反倒是邻居日本人十分重视该字典，他们当时不但大量购进，还在日本重印出版。这对于日本语言从中国传统观念演进到新的概念，有相当的作用。

笔者接着介绍一些早期来华西方人写的关于生命文章，以及中国人介绍西方生命问题的看法。其中有：

1855年英国医生合信写的《全体新论》；1856年香港教科书《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91年《格致汇编》杂志中爱凡思的《延年益寿论》；1898年美国丁韪良写的《性学举隅》；1902年梁启超写的《进化革命论者颌德之学说》；1902年樊炳清译日本岸本能武太《社会学》；1903年陈鹏译法国李若奇《哲学论纲》；1911年吴敬恒译《天演学图解》；1920年余家菊译倭铿《人生之意义与价值》；1925年瞿世英译《倭伊铿哲学》；1929年傅东华译辛古莱

^⑬ 参见拙文《再探中日近代字词交流误区》。

^⑭ 借用罗竹风《汉语大词典》，同⑪，页4696。